



北京佛教

佛教研究
汉传佛学论丛

遼金佛教研究



怡學題



怡學主編
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編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卷之二

遼金佛教研究

怡學題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辽金佛教研究 / 怡学主编 ; 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编. —北京 : 金城出版社, 2012. 10

ISBN 978-7-5155-0613-5

I . ①辽… II . ①怡… ②北… III . ①佛教史—中国—辽金时代—文集 IV . ①B949.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37014 号


辽金佛教研究

主 编 怡 学
编 者 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
责任编辑 柯 湘 李 巍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4
字 数 350千字
版 次 2012年11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0613-5
定 价 79.0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 编 100013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64215770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怡学 主编
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 编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汉传佛教研究论丛》编委会

顾 问：黄心川 杨曾文 方立天 楼宇烈 赖永海
主 任：传 印
主 编：怡 学
副主编：湛 如 胡雪峰 温金玉 圣 凯
编委会：怡 学 湛 如 胡雪峰 温金玉 圣 凯 陈金华
传 印 黄夏年 李世龙 张风雷 宗 性 圆 慈
戒 毓 定 明 能 仁 能 旻 妙 文 广 常

从佛法本身来说，教、理、行、证的修学次第，已经为佛弟子指明了修学的道路。但是，佛弟子因为自己的资质、喜好的不同，往往有所偏向，于是形成不同类型的佛法，如重义理、重实践等区别。但是，作为佛弟子来说，义理的探讨是为了将佛陀所要开示的真实事理，充分、完整地表达出来，如“阿毗达磨”虽然着重于论证“法”的自性、定义、关系等，但是其本意仍然在于“谛理的现观”，最终归宿于修证。那么，重修证的佛教，主要是从利益众生的角度，重视佛法的适应性、实效性，所以对事相的分别比较少，如初期大乘经典以“般若”、“三昧”、“解脱门”、“陀罗尼”、“菩提心”等作为中心，来表达从发趣、修行、证入的历程。虽然存在着这种不同的侧重，但都是佛法的根本都是以义理知识与实践经验相结合为中心。中国佛教其实已经非常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如天台智者大师的教观并重，这是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高僧传》将古代僧人分为十科，其中翻译、解义、读诵便属于义解门；而习禅、明律、感通、遗身、护法、兴福，都是属于实践门一类；最后一科“杂科”则是指出家人的外学修养，傍及世间经书、治世语言、礼乐文章等，无不兼通。

但是，传统意义的佛教义解，主要是注疏经、律、论，在“述而不作”中表达自己的理解与观点，当然也有一些专门性的著作。而且，这些佛教义解僧，都是从自己的信仰与经验出发，通过注疏、论著，来达到实践与弘法的目的。南北朝佛教的兴盛、隋唐佛教的辉煌，都与义解

的繁荣是分不开的。而禅宗的发展则为中国佛教注入新的生命，重视主体的体认，自己身心的解脱；净土法门的流行，激发了佛教的信仰感情，为佛教走入社会提供了方便。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禅、净的流行，在这种“简单”、“不立文字”的潮流下，中国佛教徒逐渐失去探讨高深佛理、考察繁琐戒律的兴趣。于是，中国佛教重视义理研究的优良传统便丧失殆尽。

但是，另一方面，佛学研究在佛教界之外却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近代意义上的佛学研究，应该是开始于欧洲殖民主义者侵入亚洲地区，为了维护自己的殖民统治，必须要深入研究亚洲的宗教及其文化。于是，通过接触梵文、巴利文等东方语言，开始了解佛教的理论，消化佛教的教义。在“理性主义”、“科学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这些学者注重现代佛学研究的客观性、纯学术性，形成了佛学研究的现代传统，于是佛教便成为一种学问——佛学。19世纪后期，日本佛教界开始运用西方的学术研究方法，从而推动了日本佛学研究的兴盛与发达。随着“西学东渐”、日本佛教对中国佛教的影响增强，中国开始有了近代意义上的佛学研究，这在当时中国佛教界引起很大的反响与回应，特别突出的如《大乘起信论》、《楞严经》的辨伪，“大乘佛教非佛说”的讨论，“佛教非宗教非哲学”之辩等。同时，佛教界受到时代流行的学术方法的影响，尤其是太虚大师倡导的“人生佛教”运动，高扬佛教理性主义思想，直接推动了佛教界从事佛学研究，这其中以印顺法师的影响最大。但是，

相对来说，学术界则在佛学研究上取得了更为瞩目的成就。

改革开放后，中国佛教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经过二十年的努力，佛教界基本上完成了修复寺院、重塑佛像的工作，寺院呈现出游人如织、香火旺盛的现象。于是，培养人才、弘法、学术研究等工作提到首要位置。然而，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各方面人才的紧缺无形中遏制了中国佛教事业的发展。而人才的成长与培养，又与佛教界的观念与重视程度是成正比的。

佛教学术研究真正的根本意义，不仅是了解存在于一定时空中的佛教发展形态，更是从现存的文献、文物中，去伪存真，探索其前后延续、彼此关联的因果性，从而更清楚地认识到佛法的本质，及其因时、因地的适应。了解过去佛教的真相，从中承受根本而主要的佛法特质，作为我们信行的基础，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以“以法为依，师道庄严”为所训，佛弟子闻熏正法、清净解脱，僧团弘法、办教育，皆应“以法为依”。僧团要清净和合，必须“以戒为师”，受戒、学戒、持戒，言传身教，行为规范、理念相同、经济待遇均衡的清净僧团才能体现出佛教的神圣性，这就是“师道庄严”；而且，在办教育、弘法、文化出版等事业中，更能注重“法”的清净性与“人”的师道，师资相承，清净布施。

“以法为依，师道庄严”，即“法”要清净，“人”要庄严；在“法”上，要依法不依人；在“人”上，出家人要清净和合，在家居士要恭敬虔诚，僧俗各住其位，方显“法”、“人”的清净庄严。要实现“以法为依，师道庄严”，要以“法”的教育培养“人”，即要注重人才建设，举办僧教育和居士教育；“人”要修学体证“法”，“法”才能体现、呈现，正法才能落实到世间；“人”要深入理解“法”，即要研究、研讨；“人”要弘扬“法”，“法”方能广大，即要注重弘法、文化出版。所以，教育修学、研究弘法、文化出版，是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的三大功能，也是研究所同仁们一起奉献努力的事业。

研究所成立十年以来，相继出版了《放手拈花》、《走近佛陀》、《北京佛教文献集成》、《居士教学丛书》等近百本书籍，举办“佛教节日与民俗”、“辽金佛教研讨会”、“元代北京佛教研讨会”等多次研讨会。现在，又组织出版《汉传佛教研究论丛》，推进佛学研究的发展，促使佛法能够深入社会人心，达到净化人生的效果。这一切呈现了研究所法师们无数的青春热忱，体现了数千名义工、学员们的付出。

祝愿研究所能够走得更远，越来越好！

怡学

2012年9月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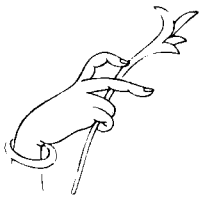
于北京广化寺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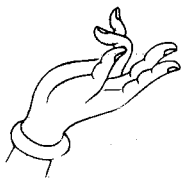
辽金佛教研究·历史篇 [001-135]

- 002 日本野上俊静辽代佛教研究 / 杨曾文
- 005 辽朝与佛教 / 野上俊静
- 024 辽朝燕京佛教述论 / 何孝荣
- 034 辽金元明时代的北京弘法寺 / 黄夏年
- 047 北京昌平辽代双泉寺的历史文化价值 / 理净
- 052 辽金时期的曹洞宗 / 赖功欧
- 060 论辽代的华严宗弘传及其影响 / 陈永革
- 075 辽代墓葬中的佛教题刻综述 / 孙劼
- 082 契丹女真文字记录的佛陀名号及其所见辽金佛教异同 / 唐均
- 089 金代官卖寺观名额与僧道度牒二题 / 王德朋
- 098 关于朱弁的追迹调查 / 邢东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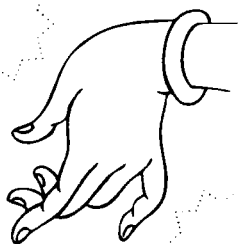
辽金佛教研究·思想篇 [136—255]

- 138 历史因果莫轻谈——我对“辽以释废”说的一点意见 / 刚晓
- 146 空门名理孔门禅——李纯甫《鸣道集说》的时代特色 / 顾伟康
- 162 护法与尽孝道：房山石经雕刻的原动力 / 李尚全
- 172 辽僧非浊《三宝感应要略录》研究 / 邵颖涛
- 194 略论金代佛道思想的融合 / 李玉用
- 209 从经幢记看辽代的密教信仰 / 王璞
- 224 《礼念弥陀道场忏法》与辽金时期的净土思潮 / 王公伟
- 233 李纯甫思想研究的几个问题 / 闫孟祥



辽金佛教研究·人物篇 [256—366]

- 258 猫又无，争甚狗？——万松行秀评“南泉宰猫” / 陈坚
- 266 略论万松行秀的禅学思想 / 昌莲
- 287 耶律楚材的佛门渊源 / 叶宪允
- 294 禅宗在辽与西夏：以黑水城出土《解行照心图》
和通理土师《究竟一乘圆明心义》为例 / 索罗宁
- 320 《俄藏黑水城文献》通理大师著作考 / 冯国栋 李辉
- 330 辽法均及嫡传弟子相关史事 / 包世轩
- 352 无碍大师谗晓与辽代佛教 / 纪华传
- 359 李屏山居士对庄子的辩护 / 韩焕忠



辽金佛教研究
· 历史篇 ·

日本野上俊静的辽代佛教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 杨曾文

日本学者对辽代佛教的研究，是从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围绕契丹民族的兴起和建辽过程、辽实行的宗教文化政策、辽代社会佛教传播与兴盛、佛教学者和著作、寺塔、契丹大藏经、房山石经等专题而搜集资料，撰写论文或专著。迄今为止，在辽代佛教的研究方面仍以神尾弑春、野上俊静两位学者的著作最有代表性，仍为学术界经常参考和引用。

神尾弑春生于1893年，1918年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在日本侵华期间曾到中国东北出任伪满“国务院”总务厅秘书官、秘书处次长、总务厅参事官等职，并出任过伪“满州民族学会”会长，1935年由设在大连的所谓“满州文化协会”出版了他的《契丹佛教文化史考》。此书对契丹兴亡及其佛教文化源流、寺塔、契丹大藏经、高僧及著作等作了考察和论述。1982年日本第一书房出版社为满足学术界的需要，将此书再版发行。书后附有镰田茂雄撰写的《解说》，对此书的内容和价值作了概要的介绍。此外，神尾弑春还著有《东方文化杂考》、《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索引》、《慧琳〈一切经音义〉的摸索》。

野上俊静（1907 - 1994），毕业于大谷大学文学部史学科，曾任大谷大学教授，在1967年至1969年担任大谷大学校长，主要从事中国辽、金、元佛教的研究。主要著作和编著有：《辽金的佛教》（平乐寺书店，1953年），与藤岛达朗共编《东方年表》（平乐寺书店，1955年）及《传灯的圣者：真宗七高僧传》（平乐寺书店，1961年），编录《中国古印图录》（大谷大学，1964年），编录《敦煌古写经·大谷大学所藏》（大谷大学东洋学研究室，1965年），《佛教史概说·中国篇》（平乐寺书店，1966年）《中国净土三祖传》（文荣堂书店，1970年），《观无量寿经私考：中国净土教的展开及其关联》（真宗大谷派宗务所出版部，1973年），《元史释老传

的研究》(野上俊静博士颂寿纪念刊行会,1978年),《中国净土教史论》(法茂藏馆,1981年)。他对辽代佛教文化的研究,虽在吸收神尾弑春的《契丹佛教文化史考》和其他学者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然而又扩大了研究领域,取得了新的成绩。

野上俊静所著《辽金的佛教》,1953年由在京都的平乐寺书店出版。全书分为“辽代篇”和“金代篇”两大部分,是他长年从事辽代佛教和金代佛教研究而撰写的16篇论文的结集,书后还附有一篇《胡族国家和佛教》。“辽代篇”收有论文8篇,包括:《辽朝与佛教》、《辽代的佛教研究》、《〈龙龕手鑑〉杂考——契丹佛教研究之一出》、《辽代社会的佛教》、《辽代燕京的佛教》、《关于辽代的邑会》、《契丹人与佛教》、《辽代佛教研究的发展》。^[1]

其中的《辽朝与佛教》,对辽代佛教作了比较系统集中地介绍。论文依据现存辽代佛教文献和《辽史》、《契丹国志》等史书以及散见于其他文献有关佛教的记载,对契丹族建辽过程中有意引进佛教的政治意图和文教政策,历朝诸帝实施的扶植佛教的措施和佛教传播发展的情况,辽代的著名学僧和著作、寺院、编印契丹大藏经和续刻房山石经等文化事业,都有比较详细的介绍。

《辽代的佛教研究》,较详细地考察、介绍了辽代学僧和他们的佛教研究情况,对著名学僧非浊及其《往生集》(已佚)、觉苑《大日经义释圆密钞》、鲜演《华严玄谈决择》、道殿的《显密成佛心要集》等文献都有概要介绍,认为辽代的佛教研究是以华严教学为中心,华严圆融思想有很大影响,同时在密教研究方面也取得显著成绩,此外在净土、戒律等方面的研究上也有成果,反映了辽代学僧具有“八宗兼学”的倾向。

《〈龙龕手鑑〉杂考——契丹佛教研究之一出》,集中对学僧行均生平及其名著字书《龙龕手鑑》进行考察和介绍。

《辽代社会的佛教》,对辽代诸帝对佛教的大力提倡和扶植,佛教广泛传播于社会的盛况,僧侣享有可任高官的优待和地位,在都城和各地广建寺院,佛教对契丹族社会的风俗和节日的重大影响等,进行了考察和介绍。

[1] 关于神尾弑春、野上俊静的情况,得到日本东北大学斋藤智宽博士提供的资料,并参考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2008年《佛学研究》总第17期所载松森秀幸《日本关于辽代佛教的研究》,谨此表示感谢。

《辽代燕京的佛教》，集中对辽代燕京（今北京）的佛教寺院及其名僧进行介绍。

《关于辽代的邑会》。在辽占领地区，特别在所谓“燕云十六州”地区的佛教与北方广大地区的佛教是相通的，随着佛教的兴盛，兴起了佛教邑会结社的活动。所谓“邑会”是“以佛教信仰为纽带而结成的，以进行各种佛教事业为目的”的结社，起源于六朝，盛于唐宋。本文对辽占地区（主要在华北地区）的佛教邑会作了比较详细的考察，依据各种寺塔碑文及相关资料，对邑会发起人及指导者的邑长、邑证及出资施舍参与活动的一般“邑人”（会员）、邑会活动的内容（念佛、修建寺塔等）及所谓“千人邑会”等进行考察和论述。

《契丹人与佛教》。契丹族在兴起和建辽过程中，为安抚和控制汉人，加强统治，曾积极引入汉人文化，在宗教方面对佛教采取积极提倡和大力扶植的政策。辽代诸帝，特别是辽圣宗、兴宗、道宗都虔诚信奉佛教，盛办佛事，发展佛教事业。本文结合历史背景，对此作了比较详细的考察和论述。文章对佛教兴盛之后对契丹族和辽代社会的广泛影响，包括在生活、风俗、习惯乃至节日方面的影响，以及辽代著名佛教学者和著作以及作为辽代重要文化事业的编刻契丹大藏经、在房山继续雕刻石经等，也有介绍。

《辽代佛教研究的发展》，按时间顺序对日本辽代佛教的研究情况和取得的学术成果进行概要介绍。文章对日本早期研究辽代佛教的成果，如1912年胁谷摺谦《辽金时代的佛教》、妻木直良《论契丹大藏经雕造的事实》；1913年胁谷摺谦《辽金佛教的中心》；1914年常盘大定《契丹的佛教》；1930年松永有见《宋辽时代的密教》；1935年冢本善隆《石经山云居寺与石刻藏经》等著作及他本人先后发表的关于辽代佛教文化的论文，都作了详略不同的介绍。

野上俊静是日本对辽代佛教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取得了可观的成果。然而因为受时代、政治学术环境和资料不足的局限，不仅有些名称、说法已经过时，他的一些考察和结论也有待进一步修正或补充，而且有些观点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尽管如此，野上俊静在辽代佛教文化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至今仍很有学术价值，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

辽朝与佛教

[日本] 野上俊静 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 杨曾文 译

一

辽是从公元 907 至 1125 年之间 219 年活跃于东亚之国，领土大略占有现中国东北及内蒙古与外蒙古，东边沿海州濒临日本海，南据现河北、山西北部的所谓“汉地燕云十六州”的地方。

辽的建国者是契丹族。契丹族属于北方民族，原来有萨满教即巫的信仰。例如资料上有女巫取人胆做延年之药，在建国初期的仪式中有男女巫跟随的记载。这种信仰本是契丹人精神生活的全部，在日常生活中碰到不可解释的现象时必须求得巫的暗示。

然而契丹族征服四邻各部族，建立辽国，将多数汉人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势必接受汉文化的洗礼，从而原有对巫的信仰逐渐淡化，佛教信仰开始浸润于社会。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同为汉人信仰的宗教道教却被佛教的兴盛所掩蔽，在辽几乎没有踪迹显露。

清朝的史学家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卷二十七设有“辽族多好文学”一节，举出契丹族喜好汉诗汉文，并善绘画的不少事例。一般认为契丹族在进入辽国中叶以后受到汉文化很大影响。辽朝多位皇帝不仅保护佛教，而且进而亲自崇拜，带有从政策显彰佛教的意义，这岂不是尊重汉文化带来的一个具体现象？

历史证明，大凡宗教信仰流行，无论遭遇怎样强烈的外部压迫也是制止不了的；另一方面也不可否认，在当政者的保护之下能促使宗教或是宗教教团得到迅速发展。辽朝给予佛教很大的保护。辽道宗表现尤为突出，以至遭到为金人尊崇为“小尧舜”的金朝一代英主世宗的痛骂：